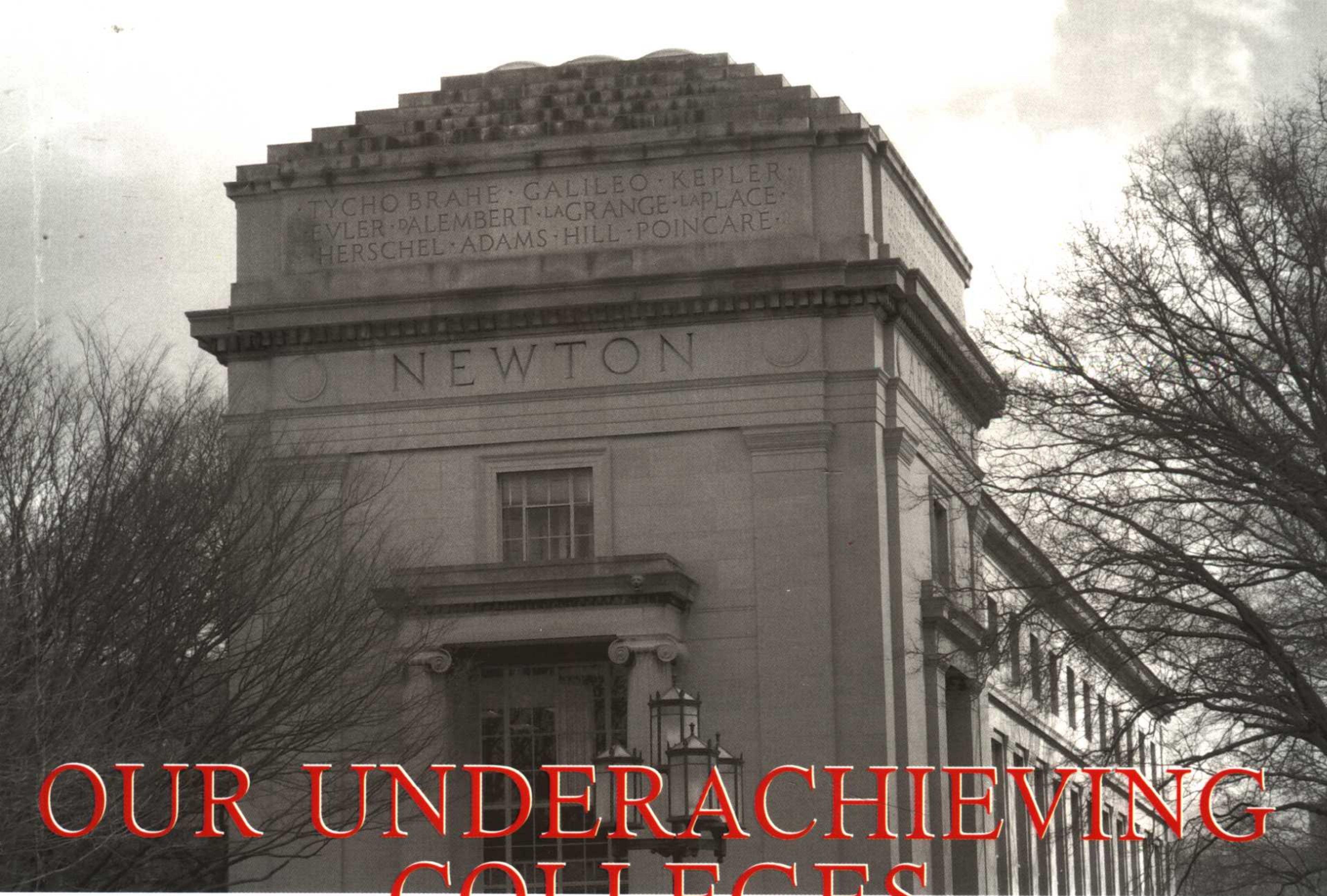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回归大学之道

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詹姆斯·H·柯林斯 著
陈维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回归大学之道

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德雷克·博克 (Derek Bok, 哈佛大学前校长) 著
侯定凯 梁爽 陈琼琼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大学之道/(美)博克著;侯定凯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617-5872-4

I. 回... II. ①博... ②侯... III. 高等学校—学校教育—研究 IV. 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474 号

回归大学之道

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著 者 德雷克·博克
译 者 侯定凯 梁 爽 陈琼琼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张 苏
责任校对 侯侯华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宜兴市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72-4/G·3402
定 价 3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者序

德里克·博克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2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多产作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超越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1984)、《美国高等教育》(Higher Learning)(1988)、《大学与美国的未来》(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1990)、《河之源:大学录取中关心种族问题的长远影响》(The Shape of the River: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1998)、《市场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商品化》(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2003)等。博克以其勤奋的著述,不断向读者传达他关于大学教育的信念,也彰显了他作为大学校长的教育领导力——不仅以其卓越的管理成就,更以其深刻的反思和雄辩的语言,把世界名校的治校和教书育人的思想撒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撒播到所有渴望升华大学精神的人们的心里。

眼前这本《回归大学之道》,是德里克·博克的又一高等教育专著,其最大特点在两个方面:第一,突出了本科教育在当今高等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明确提出了关于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框架;第二,全面、细致地运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分析了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与那些以激烈批评言辞夺人耳目的作者相比,德里克·博克对本国高等教育的批评平和了许多,但也更显其诚恳和建设性。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美国大学本科教

育的六大问题,尤其发人深省:教授工作目标的偏移(过度追求合乎自己兴趣的学术世界)、学生一味以高薪职业为求学目标、不同系科之间的教师合作障碍重重(课程目标因而缺乏整体性)、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脱节、忽视教学工作(特别是在一些研究型大学)、没有建立一个积极有效的学生课外活动环境。

或许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本科教育目标和质量只能成为人们辩论的话题,落实起来却太过棘手。但在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前,我们是否真的认同了本科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如果这个信念是明确的,那么我们自然会去积极寻找合适而具体的目标,并孜孜以求,一如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那样。

或许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处于社会、政府和校内力量的多重压力下,大学校长很难能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但是,博克提醒我们:大学校长其实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资源,以贯彻自己的教育改革思想。关键是:校长、院长们是否愿意去动员这些资源和权力!

30多年前,在德里克·博克即将上任哈佛校长之际,他的一位朋友向他提议,本科教育已经不合时代,应该取消哈佛的本科教育。^①如今,德里克·博克用他的文字,为本科教育正本清源,而他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大学领导人使命的一次回归!

侯定凯

^① 德里克·博克. 美国高等教育[M]. 乔佳义编译. 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25.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三位研究助理多利·基亚利(Dolly Bross Geary)、基尔南·马休斯(Kiernan Mathews)和爱琳娜·辛申科(Elena Zinchenko)为我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启发了我的思路,给我帮助良多。我的其他同事也阅读了本书各章内容,并作了有益的评论,他们是:达拉·迪尔多夫(Darla Deardorff)、蒂齐亚娜·迪琳(Tiziana Dearing)、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戴博拉·休斯-哈雷特(Deborah Hughes-Hallett)、卡罗尔·施奈德(Carol Geary Schneider)、南希·索莫斯(Nancy Sommers)、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迪恩·惠特拉(Dean Whittle)。以下五位通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挚友理查德·莱特(Richard Light)、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主席迈克尔·麦克弗森(Michael Mc Pherson)、我昔日的合作伙伴詹姆斯·舒尔曼(James Shulman)、我的女儿希拉里(Hilary)和我的夫人西塞拉(Sissela)。最后,我的助手康尼·希金斯(Connie Higgins)以其超凡的耐心和毅力整理了我的书稿,我已经记不得其间她几易其稿了。对于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我致以深深的谢意。

目 录

译者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	7
第二章 教师对本科教育的态度	19
第三章 大学教育的目标	35
第四章 学会表达	49
第五章 学会思考	65
第六章 培养品德	87
第七章 培养合格公民	102
第八章 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园	116
第九章 为全球化社会做准备	136
第十章 培养广泛的兴趣	153
第十一章 为职业生涯做准备	169
第十二章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展望未来	187
注 释	207
索 引	250

导 言

1980年代,美国的大公司开始面临海外资本的竞争,日本产品开始全面“入侵”我们的商店。此时的美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政府官员、记者和分析家们四处寻找美国竞争力下降的可能原因。公众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企业的行政主管们,接下来遭受抨击的便是教育。1983年,一个全国委员会对公立中小学进行了调研,并发表了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该报告警示说,美国教育正在经历“一股平庸化的浪潮”¹,这无异于一次“单方面的教育裁军行动”。于是各种评论紧随其后,人们要求对教育作全方位的改革。

公立中小学饱受抨击之时,对大学发展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便预计到,高等教育终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果不其然,仅仅过了几年,教育部部长威廉·贝奈特(William Bennett)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会长琳·切尼(Lynne Cheney)相继对本科课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具体的改革建议。²像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查尔斯·塞克斯(Charles Sykes)为代表的记者,也都纷纷加入到抨击大学政策的行列之中。³

大学教授们(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文章,对自己所在的大学习针砭时弊。以下著作代表了作者们的普遍观点:《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濒临毁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道德沦丧的大学》(*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终身教授中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反智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Intellect*)、《圣殿里的骗子》(*Impostors in the Temple*)、《扼杀大学灵魂》(*Killing the Spirit*)。⁴ 艾伦·

布鲁姆(Allan Bloom)所著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还进入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他著作的影响虽不及此书,但也几乎都由著名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赢得了广泛好评。

- 2 这些著作的作者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其一,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非所有的本科院校;其二,这些著作都以批判为主要目的,难见对大学和教授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三,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批判言辞之中,有几个共同的话题被反复提及,还引起了读者的共鸣。^①

本科课程体系缺乏统一目的,是众多作者的共识。正如布鲁姆所言:“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大学对此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没有提出可供辩论的不同观点。”⁵ 比尔·里丁斯(Bill Readings)则这样写道:“博雅教育已经丧失了其组织核心——博雅文化和人文科学的渊源与目标。”⁶ 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统一的教育目的,大学的课程体系便逐渐演变为由选修课堆积而成的“自助餐”。知识本身则变成了万花筒,不同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要教会学生融会贯通犹如天方夜谭。因此,就像布鲁士·威尔谢尔(Bruce Wilshire)在《道德沦丧的大学》中所说的那样,本科教育已经变得缺乏连贯性,无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处世”之类的深层次问题。⁷

- 3 有不少作者提到,由于大学任由学术标准下滑,本科教育的质量已经开始贬值。⁸ 他们指出,人们因为顾忌于所谓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②,校园里的言论变得不再完全自由。赞助性行动^③破坏了教师聘任工作的公信力。学术大家的论文开始让位于一些平庸之作,其原因仅仅是:后者出自女性、黑人或第三世界国家学者之手。追求真理与客观事实的崇高学术理想,以及评判学术成果质量的传统方式,在解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抨击下摇摇欲坠。⁹

① 本书仅探讨本科教育的质量问题,在此不涉及学费、招生政策、经济资助等问题。——作者注

② “政治正确性”是1970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的词汇,表示言论或行为不应含有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译者注

③ 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19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推行的一项政策,旨在补偿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妇女在过去受到的歧视,鼓励其被优先录取、录用、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译者注

另一个普遍提及的问题是：大学开始逐渐变为提供就业帮助的训练营。教育部部长前助理戴安妮·拉维奇(Diane Ravitch)写道：“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就业训练基地，博雅教育已不再是它的核心。”¹⁰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则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知识，是指立即能派上用场、能见到成效的信息……我们的教育是为了满足经济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培养富有批判性、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反思能力的个性化群体。”¹¹持类似观点的作者还指出：过去几十年里，选择专业时看重职业前景的学生在大幅增加，而选择传统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则在减少。学生们蜂拥而至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医疗保健等专业，大学开始迎合本科生的职业需求，而把丰富学生学识、帮助他们过上自省而充实人生的培养目标抛之脑后。

还有一种批评声是针对教师无暇关注学生这一现实的。在《学术骗局》(*Profscam*)一书中，作者塞克斯批判终身教授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聘任同行时只考虑学术声望，从不关心教学质量。¹²能激发学生灵感的年轻教师可谓凤毛麟角，但他们却往往无法获得晋职的机会。作者们还指出，教授们很喜欢在大课中实行“填鸭灌输”的教学方式，而把小组讨论交给毫无经验的研究生去组织——教授们很清楚，真正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的环节其实是后者。于是，本科生被淹没在讲座制课堂的茫茫人海之中。到大学毕业之时，许多学生与教师没有深交，甚至不好意思让教师帮自己写推荐信。

许多人都在惊讶：为什么《学术骗局》和《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之类探讨本科教育的书也能如此畅销？其实这并不难解释。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上了大学，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能拿到学士学位。事实上，要想成为律师、医生、牧师、科学家、中小学教师，大学文凭是起码的要求，未来所有的企业管理者、立法者、政府高官也都要如此。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因此，这些作者不惜笔墨地谈论大学教育，所著之书能吸引大量读者，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之外，其他国家的飞速发展也迫使我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本科教育问题。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化，使许多工作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完成。如今，远在班加罗尔(Bangalore)^①、北京等地的高级技术人员，能够

① 印度城市。——译者注

轻松地与美国的同事越洋对话,与同在一幢写字楼里交流并无二致。美国人每年在印度制作几十万份纳税申报表;澳大利亚的医生在分析美国医院里拍的CT图;中国的科学家在为微软公司研发产品;俄罗斯的工程师在设计波音飞机。美国学校培养出的聪明人才不再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¹³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力图有所作为,科技的发展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诸多理由,提醒自己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美国大学课堂里发生的一切。

- 美国大学也将面临来自海外的竞争。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大学在世界上可谓独占鳌头,这得益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面临的诸多困境:教师薪水偏低、学生人数过多、设施不足、国家过分干预。美国的教育者们已经习惯于将全世界最具才华的学生网罗至此,并以此提升美国公司、医院及其他机构中高级人才的质量与数量。然而,最近几年来,欧亚各国已经开始关注大学的发展,它们意识到在当今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一流的科研和教育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
- 6 随着印度和中国的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将有能力为毕业于本国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供具有挑战性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到那时,美国想要吸引人才就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容易了。

迫于其他国家飞速发展带来的压力,美国的学生、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不敢再对高等教育及其教学的质量有所怠慢。教授和学术领袖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尤其需要牢记大学服务于大众的根本目的,避免将大学变为纯粹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但是,拒绝商业化并不意味着拒绝变革。相反,大学应当意识到裹足不前的危险性,并将来自世界范围的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通过客观的自省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将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遗憾的是,在过去20年的批判浪潮中,人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改革建议。事实上,这些批评也显得底气不足。如果这些批评有那么点道理的话,学生和家长们一定会站起来抵制大学的。毕竟,上大学的花费可不是笔小数目(哪怕就读公立大学)。无论是期望进入大学的,还是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们都期待着能接受一流的教育。如果大学真的陷入了危机(课程体系缺乏连贯性,教授无暇顾及本科生),学生们为什么还对大学如此趋之若鹜呢?家长们为什么还肯花大价钱,一方面到处打听怎样充实子女报考大学的申请材料,一方面请家教帮助子女提高大学入学考试的分数呢?¹⁴

这些批评家或许会这样回应以上质疑：学生这样做并不是肯定大学的现状，7 而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张通向美好未来的“门票”，因为如今的大学学位是未来成功的起码要求。然而，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学者们已经对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做了无数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自己的大学经历非常满意。美国人不喜欢自己的政府，对大多数的社会机构也充满质疑，却有超过 75% 的校友对本科经历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¹⁵ 当那些气势逼人的专著面世后不久，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超过 80% 的本科生对所在大学的教学状况感到满意。¹⁶ 后续的几个调查又表明：多数学生对师生交流状况表示满意。¹⁷ 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如果有机会再作选择，他们仍会选择现在就读的大学。¹⁸ 在那些被列为批判典型的顶尖大学——例如，斯坦福、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学生的满意度甚至更高，校友从不吝惜对母校的溢美之词。¹⁹

既然在校生、毕业生、家长对大学的评价都如此之高，为何这些作者对大学的抨击却如此猛烈呢？所有作者都对此避而不谈。或许他们没有关注学生的意见，或许他们认为本科生尚没有能力作出准确的评价（布鲁姆便是持这一观点）。但无论如何，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亲身体验大学教育的学生对其抱怨甚少？评论家和学生谁对谁错呢？或者他们都错了，或者都没错？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在考察了大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后，我找到了多数校友满意于大学教育的 8 原因。大量研究发现：总体上，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知识面、道德推理能力、数理能力(quantitative reasoning)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²⁰ 多数大四学生认为自己在智力上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这些结论同样得到了就业市场的认可：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待遇远高于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人。

这些有利于大学的证据似乎在说明：批评家对大学的评价过于苛刻和片面。然而，这些证据同样无法证明大学“一好百好”。尽管在校生和毕业生对母校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但正如本书通过近距离考察美国高校得出的结论一样：高校固然使学生受益匪浅，但它们却远未达到应有的期望值。许多毕业生的文字功底无法令雇佣者满意。尽管教师们把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但许多毕业生仍然不能对复杂的非专业问题作出清晰的推理和分析。能够使用一门外语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多数人甚至没有选修过一门有关“数理推理”的课程，没有掌握民主社会中“知识公民”应该具备的知识。以上这些问题不过是所有问题的冰山一角。

我提到的这些问题与那些批评家有所不同,他们很少认真地关注学生学了
多少东西,很少深入大学课堂去考察学生到底学会了什么。不过这些重要问题
9 并非无人问津——一些教育研究者试图准确描述学生的学习状况,并寻找改进
学生学习的
有效方法。但是,这些研究者很少谈及研究成果对教育制度改革的意义。而且,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散见于各种专业期刊和无人关注的研究报告中,只有教育研究人员才会有所涉猎。有些教授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教学中尝试新的解决之道,但多数教授仍然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虽然有教授委员会定期评估课程体系,但委员会似乎对教育研究专家指出的本科教育问题置若罔闻。在整个本科教育体系中,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耸立着一道屏障——尽管这里的实践者也是教授,也经过了科研训练的熏陶,似乎应该时刻准备着将实证研究者的发现为我所用。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着充分利用现有关于“学生学习”与“大学对学生发
10 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去推倒这道屏障。^① 尽管我们对教学的研究尚嫌不足,但也足以借此对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重大问题提出见解。本书所呈现的是一幅学生在大学里如何成长的清晰图画。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既不同于那些著名批评家的论述,也不同于本科课程评估委员会定期发布的报告。

好消息是:只要有足够的意愿,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坏消息是:在今天的校园里,多数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负责教学质量的主管人员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别提清楚地理解这些问题了。这便是我写作本书的真正原因。

^① 本书并不局限于对研究性大学的分析,也不局限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中名次靠前的高校。相反,本书关注所有四年制大学。或许有人会质疑:任何一本书都无法涵盖公立大学、文理学院、教会大学、女子大学及城市大学的所有情况。诚然,这些高校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有必要时我会专门提及这种差异,但是规模、设施、学生质量等方面的差异无法掩盖美国本科教育的一大特点:如果排除学生天赋和成长背景等因素,这些差异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发展影响甚微。正如两位著名学者对几百项研究做的综述一样:“对美国大学进行分类、排名、研究的维度包括公私性质、规模、招生淘汰率等。即便考虑到所录取学生的特征,这些维度与学生学习、成长、发展的差异毫无关系。”[Ernest T. Pascarella and Patrick T. Terenzini,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Vol. 2: *A Third Decade of Research* (2005), p. 641.]社区学院确实与四年制学院大相径庭,本书将不论及此类学校。我认为,尽管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完全能做到用一本书来涵盖整个美国的本科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作者注

第一章 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

今天美国的本科教育和殖民地时期 9 所学院所提供的教育有着天壤之别。¹¹即便在建国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大学的入学率也没超过 2%,同时严格意义上的科研活动尚未展开,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知识体系当时也未建立起来。直到 1940 年,每 20 位成年人中才有一位获得学士学位。招生的大幅增加,各种高级实验室的建立,学者与教师充斥校园,这些都是近 50 年来大学里发生的变化。

要想认真地探讨当今美国大学的问题,就必须对其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只有了解大学校园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才可能判断“通识教育的质量正在下降”的批评是否合理。如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深谙大学之道:本科教育的哪些部分可以灵活变通,哪些部分则亘古不变。如果不掌握历史,我们甚至无法肯定:看似“新的”政策果真是新兴事物,或只是某出历史悲剧的重演?最起码,任何人在批评或改革本科教育之前,都应该对其历史烂熟于胸:几百年来本科教育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哪些特征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¹

12

本科教育的历史发展:简要的回顾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学院与宗教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更类似于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①,而不像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学生在课堂内外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约束,学生的行为准则都有详细的成文规定。教师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执行这些规定、惩罚违规者。仅仅为了明确学生在礼拜仪式上的行为规

^① 精修学校是一种强调文化学习的学校,其学生通常为贵族或社会精英的子女。——译者注

范,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①校方便写满了整整两页纸。当年的耶鲁学院甚至规定:安息日的亵渎行为、公开质疑《圣经》的真实性、(个人)奢侈消费均被视为校园犯罪。²

当时的课程都是统一必修的,通常包括数学、逻辑、英语、古典语言(主要为拉丁语和希腊语)。在课堂上,学生通常需要背诵古典名著中的段落,教师则时刻关注学生是否背诵有误。尽管许多学院也开设了诸如天文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但主干课程仍是帮助学生领会亚里士多德等智人的思想,而非讲解实验、传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学生通过这些显性课程收获有限。许多学生觉得,在非正式的俱乐部、文学社团里学到的知识更多——在这些课外活动中,他们可以展开辩论,阅读现代文学,探讨严肃的话题。³

- 13 尽管南北战争之前的学院盛行古雅离奇之风,但它们却毫不含糊地追求两大目标——训练智力和塑造品格。对这一古典模式最有力的维护,莫过于1828年的《耶鲁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学教育的主旨不在于传输某种实用的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⁴在《耶鲁报告》的起草者们看来,古典模式的教育最适合于这一主旨。

培养心智的途径便是让学生刻苦学习——翻译古典语言,就难题展开辩论,解决数学问题。正如当时的一名校长所言:“如果你想让头脑更灵光,那就让它运转起来吧,把它使用到极致。一项任务完成了,再转向第二项、第三项,不断地征服困难直至成功。”⁵但到了19世纪末,这一激励人心的思想却被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实验推翻了,因为桑代克证明,不辞辛苦地翻译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所培养的技能,无助于学生分析和解决用非拉丁文语言陈述的问题。

- 塑造品格的途径则是要求学生学习古哲名言,严格遵守校园行为准则,每天不得缺席礼拜仪式。南北战争之前的大多数学院都为四年级学生开设了“道德哲学时务”的必修课,而且通常由校长亲自任课。这一高级课程涉及的范围颇广——道德原则、历史、政治以及移民、奴隶制、言论自由等时事话题。课程目标也是多元化的:让学生明确伦理道德的准则;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在许多学生看来,这门课程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唯一亮点。
- 14

到19世纪末,传统课程已经疲态尽显。实验科学及现代语言文学逐步在课

^① 殖民地时期名为“国王学院”。——译者注

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教师们开始抱怨,自己的精力不应该浪费在执行行为规范上。学生们则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他们开始纷纷远离大学校园,1850年至1870年之间,美国的本科生入学率呈下跌的趋势。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兰德(Francis Wayland)的评论言简意赅:“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正在减少。”⁶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得益于联邦的赠地及工业界的慈善捐赠,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校长^①或开办新大学,或对以前的大学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这些改革先锋推崇德国大学的模式——开展科研活动,将自然科学纳入学科体系,开设博士学位的课程。这些最终让教授们拥有了“学者兼教师”的双重身份。

这些变革的冲击很快波及到本科教育。传统的古典课程开始让位于新兴的实用课程。现代语言文学课程的势力不断扩张。物理、生物、化学课程随处可见。私立大学开设了商务、工程学等职业课程,而公立大学在职业培训方面走得更远。劳伦斯·维希(Laurence Veysey)的历史研究表明:“在19、20世纪之交,诸如教育学、家政学、工商管理、卫生学、体育、工程学之类的非传统学科,在一流 15 大学里已经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⁷

美国最顶尖大学的改革更为激进。譬如,哈佛校长埃利奥特不仅反对传统的统一课程,而且要求取消所有的必修课程,以便让学生完全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内容。1909年,当他四十年的校长生涯走到尽头之时,必修课只剩下了一年级新生的英语写作课和外语课,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课程。康奈尔校长怀特也非常推崇学生自主选择,他这样解释课程选择的自由化倾向:“培养心智必须方法得当,不能向学生的头脑灌输他不愿学习的知识,这就像补充营养也要方法得当,不能强迫人咽下不喜欢的食物……刻苦学习固然重要,但只有学习时充满热情和兴趣,心智锻炼的效果才能最好。”⁸

宗教势力也失去了对大学的控制。人们日益认识到,摆脱宗教控制有利于大学的管理,坚定的宗教信仰也不再被视为学生品德发展的核心。许多大学都

^① 这四人曾分别任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译者注

不再强制要求学生参加礼拜仪式,此时的宗教活动更像是众多课外活动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并非所有校长都赞同自由选课的趋势,有人顽强地坚持和维护着古典模式。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詹姆斯·麦科什(James McCosh)就极力反对埃利奥特的改革。他对埃利奥特的公然抨击,让人们回想起了威廉·贝奈特任教育部部长时所作的文章:

16 请别告诉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美国曾经最杰出的大学,竟不再要求毕业生学习最完美的语言、最华丽的文学、最高级的古典思维方式。请别告诉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大学:继承了剑桥衣钵的哈佛大学,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数学。请别告诉苏格兰大学和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美国的清教徒学院中,学生不必学习哲学和宗教也能顺利毕业。⁹

面对批评声,埃利奥特校长不为所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之风开始转往他所引领的方向。1890年,普通高校中还有80%的课程是必修课,但到了1901年,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高校的选修课比例达到了70%以上。¹⁰而到1940年,普通高校中的必修课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0%。

不过,埃利奥特的理念终究太过极端,即便在他统治的哈佛也无法维持下去。尽管没人想回到旧式的古典课程体系,但多数教育者认为,埃利奥特的“完全自由选修制”又有些矫枉过正。选课自由显然无法如怀特所愿——让学生“刻苦学习”。埃利奥特卸任之时,55%的学生在毕业前实际只选修了一些初级课程,超过70%的学生没有选择某一专业领域深入学习。¹¹许多本科生尽可能地逃避学习,靠考试前请家教,帮自己的脑袋填满不多不少的信息,只求通过期末考试便万事大吉。

同时,各种社交俱乐部和兄弟会(fraternity)^①在大学校园里发展起来。校17 际体育比赛也搞得红红火火,橄榄球比赛能吸引数万名在校生及校友声嘶力竭地为之加油呐喊。全国各地的本科生都在寝室里挂上海报,写着“别让学习干扰到你的大学教育”。¹²在许多本科生看来,大学并不是接受智力训练的场所,而是

^① 美国大学的兄弟会(fraternity)或姊妹会(sorority)是一种学生社团,一般限于本科学生。通常都会用1~3个希腊字母来代表一个兄弟会的名字(比如ΓΨΦ)。——译者注